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 一 早年的两个阶段
- 二 前期的两个阶段
- 三 知识分子的主题

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有两部散文文学可以百读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①。《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文章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① 鲁迅的杂文，是应作为整体来看的艺术品，诚如鲁迅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

在这样的境地中,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研究鲁迅的书籍和论文已经不少。当然,有着许多好的研究论著。一些基本问题,例如评价,在1949年后取得无可动摇的公认,本文想以这些成绩为基础,接触几个有争议或被忽视的问题,主要谈鲁迅早年和前期的思想发展。鲁迅所以超越他的革命同辈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原因之一在于他以自己早年和前期的亲身经历,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各种惨痛教训,清醒地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战略,并坚持到最后一息。

一 早年的两个阶段

“国民性”是鲁迅早年 and 前期十分关注的问题,它经常占据鲁迅思想活动的中心。探索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对了解鲁迅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非常重要。

如果从少年时代算起,鲁迅思想一开始就有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如鲁迅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滋味,总催促着

少年心灵的早熟。这比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更容易体受到中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奸诈,从小锻炼得敏锐、清醒、愤慨而坚强。另一方面,又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自序》)^①。朴实的农村环境、诚挚的农家伙伴、田园风景^②,民间社戏……,从小又给这颗敏感的心灵以难以忘怀的慰藉和温暖,“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有所憎,有所爱,对“世人面目”的洞察和憎恶,对农村乡民的亲近和同情,它们交织起来,是使鲁迅日后着眼“国民性”问题的重要因素。而在五光十色、形形色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鲁迅几十年始终憎爱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作品中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中的美学风格,不都可以追溯到这童年一少年时代的生活印痕么?^③

青年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进了为当时社会所讪笑不齿的洋学堂。在这里受到了时代潮流——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精神洗礼。打开了眼界,接受了启蒙,并到日本留学去了。这时所谓启蒙,是指当时传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想。其中又特别是以严复《天演论》为代表的达尔文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鲁迅早年不止一次读《天演

① 鲁迅对农民和农村的了解,更重要是在日本回来在绍兴教书的时候,但这时与农民的交往,仍溯源于童年期认识的基础上。

② 如“我生长在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者就是”,(《准风月谈·秋夜纪游》)等等。

③ 自佛洛伊德学说在西方广泛渗入文艺研究和作品、作家分析后,童年决定性影响被极度歪曲和夸大,但在我们这里,童年一少年期的影响又常被完全撇开或忽视,这也不利于深入分析艺术家的个性特征。

论》，并且不是一般地读，而是熟读得能背诵。^① 严复宣传社会必然进化和号召人们必须发奋自强的观点，是鲁迅最早接受并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和信念。但这里的鲁迅特点是，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包括革命派在内，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救亡的理论武器，鲁迅却更多地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予以批判地对待。不久之后，他就坚决反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兽性爱国”（《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在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积极于学理工、政法、军事等等以图维新或革命，认为这是救国之道时，鲁迅又有自己的不同考虑。他选择了学医，到“还没有中国学生”的仙台医校去，其后又弃医而弄文，提倡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决心从事不为当时革命派所重视的思想启蒙工作^②。学医是为了救人，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像他父亲那样被误治而死。弄文还是为了救人，因为“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③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第一声呼喊，《阿Q正传》《示众》等等小说中不断提示的“国民”精神上的落后、麻木、愚弱，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植根和开始于弃医弄文这一重大思想转折的。这一转折是鲁迅日益区别于当时先进人物如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有一天，我们谈到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

② 当时改良派如梁启超等倒注意这方面工作，如梁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参阅本书论梁启超文。

③ 鲁迅晚年题词：“杀人有将，救人用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遗，小补之哉，呜呼噫嘻”，也可说是早年弃医弄文思想的成熟表现。

之特征所在。

所以,关于鲁迅早年思想及作品,不能撇开这个十分明白的发展关键,把1903年与1907年的论文混为一谈,看作同样水平,等同看待和引用;甚至不提后者,却把前者说得极高,这是不符合客观史实的。事实上,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说钿》、《中国地质略论》与1907年后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和思想发展的痕迹,而后者远为重要。前者主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反帝、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等思想^①,基本没有超出当时革命派先进思潮的范围(当时革命派的爱国主义是火热的,进化论和唯物论思想也很突出)。后者却是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哲学、文艺思想,并开始具有鲁迅个人独特色彩。前者主要还在严复的影响下,后者则表现了章太炎的影响。严复和章太炎是影响鲁迅早年思想最重要的两个人。其中,章太炎又更为重要^②。

如果说,《人之历史》是前一时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那么《科学史教篇》则是由“科学与爱国”走向提倡文艺运动的过渡。它着重提出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归纳与演绎、经验与数理并举),强调反对浅薄的实利和功用(反对只重“有形应用科目”等等),这一方面仍不脱严复影响,另一方面又超出了严复^③,此文的结语是:“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

① 近来好些论文把《说钿》说得极高,大有抬入辩证唯物主义之势,本文不同意此说,而认为《说钿》只是自然科学的朴素立场。

② 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从政治、思想、学术、文风到个人交往,是值得详尽分析研究的,可惜至今未有详细论著。本文暂只能简略提出这问题。

③ 严复也着重理论科目和科学方法,认为这才是各种应用科学和工艺技术的根本。但严复偏于经验和归纳,对理论思维和理性方法缺乏足够估计。参看本书《论严复》。

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呵芬(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卡莱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由科学始,以文艺终,由宣传科学进步始,以提出人性问题终,这就与严复没有干系了。

随后几篇论文,特别是《破恶声论》,明显表现了章太炎主持《民报》时期的思想影响。但鲁迅在接受这些影响的同时,又超出了章太炎。

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潮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章太炎的思想是别具一格,颇有异彩的^①,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一派人(不是全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或反映了走向崩溃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农民阶级(不是贫雇农而是自耕农)的某些特征和气息。章太炎的思想特点与此有关。鲁迅与章太炎在思想上的接近,实际也以此为基础(虽非自觉意识到)。章太炎跟当时革命派许多人不同,几乎全面反对严复。章太炎大讲“俱分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民报》七期《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对于改革社会没有什么用处。^② 鲁迅则坚持进化论,不赞成“俱分进化”,认为社会后必胜前,这是不同于章太炎那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地方。然而,章太炎那种艰苦朴实毫无近代浮华的乡土作风,他当时与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叛徒蠹贼的毫不妥协的光辉论战,他那与人不同的几乎全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对鲁迅都是很有影响的。章太炎反对崇拜西

① 参阅本书《章太炎剖析》。

② 此文一开头便引赫胥黎以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在《天演论》中更多是以斯宾塞反对赫胥黎,章太炎相反,鲁迅更接近章。

方,轻视自己,章太炎反对议会民主,反对贱古尊今,他斥责和揭露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罪恶和虚伪,甚至对资本主义科技进步也加非难(因为这种进步以人民愈益苦难为代价)。他主张讲求道德,建立宗教,提倡国粹。“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民报》六期《演说辞》),这是章太炎 1906 年出狱到东京,在革命派欢迎他的盛会上提出的著名论点,以后《民报》上他的好些重要专论就是发挥这一论点的。总之,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和改革武器,来作为首要的宣传任务和工作课题。章太炎这种思想与鲁迅原来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有相通和接近之处。鲁迅这时不但也极力斥责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皇皇然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坟·文化偏至论》),而且认为破迷信、毁偶像、禁赛会(指民间以酬神名义的节日活动)、嘲神话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宗教迷信、民间酬神等等娱乐活动看来似乎是违反科学的,但它们正是人们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要求和“形上需要”。“后之宗教即以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表面看来,这似乎比前一时期如《说钅》之类朴素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要倒退,其实却是为探索国民性问题而迈入历史文化领域的曲折前进。一般论著常把 1903 年就说成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就很难解释 1907 年后的历史唯心主义。实际上,不仅在哲学思想上,而且在政治思想上,鲁迅也没有停留在 1903 年反帝爱国的水平上,没有满足和满足于当时改良派要求的立宪和革命派主张的共和(都是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相反,他认为“托言众制,压制乃烈于暴君”,“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古

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文化偏至论》）^①。表面看来，这似乎相当保守和落后，其实是独特地表现或反映了对资本主义那一套毫不信任的农民阶级的某种思想情绪。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一再突出“农人”与“士夫”的对比：“……仅能见诸古人之记载，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盖浇季士夫，精神窒息，惟肤薄之功利是尚”，“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农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破恶声论》），如此等等。这可说是前述少年时代的情感爱憎的理论化，它表明鲁迅完全站在“农人”的朴实的道德、品德与风习一边，^② 对上层社会来的无论是旧的或新的种种“破迷信、崇侵略”之类的理想、理论、风气、习俗予以摈斥、抵制和批判。不但地主阶级的，而且资产阶级的某些意识形态也都包括在内了。

正由于此，鲁迅早年的进化论思想也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也好，在实质上便有与一般很不相同的特色在。这就是：从少年到早期直到以后，鲁迅心目中总有着他未能忘怀的广大农民的身影，鲁迅的同情和注意总是在这一边的。正因为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成为鲁迅许多作品的基本主题。正因为此，“麻木的神情”与“强壮的身体”相映对，才使鲁迅决然弃医而弄文，由宣传科学而提倡文艺，希望使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从那种种落后、愚昧、麻木、被动的处境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精神面貌意识形态有个根本改变。国民性问题的提出，是以它为根本基础的。

① 参看《章太炎剖析》。

② 同上。

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黄金黑铁”^①或政法理工,而是文艺、道德、宗教,总之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关键所在。不奇怪,鲁迅由此得出的改变国民性的第一个答案便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人张,沙聚之帮由之转为人国”;“多数之说,谬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②……。鲁迅认为,“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今天一些人维新救国又“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因之必须掊物质,尊个性,反流俗,轻多数,提倡拜伦、尼采、易勃生。鲁迅当年的确是醉心于这些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有人说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坟·杂忆》)。当时流行的拜伦热,使鲁迅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今天读来仍颇有声色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摩罗诗力说》。鲁迅当时也是喜欢读尼采的,^③在这些文章中,就有“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之类充满尼采思想的句子。鲁迅在这里总的要求是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解放。要这样,这必须冲破束缚,打碎枷锁,而这种束缚、枷锁则正是以所谓“舆言”(舆论)“俗囿”(习惯)“多数”“庸众”“一致”(“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的形态出现

① “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摩罗诗力说》)。

② 章太炎《四惑论》:“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牵制,……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亦一切不得自由也”,“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惨刻少思,尤有过于天理”,也是强调个性不应为社会抑制等等。当然鲁迅与章太炎的思想并不可等同。

③ 章太炎当年极力提倡“依自不依他”的主观唯心论哲学时也多次提到尼采。

的,它们构成了种种“伪饰”“陋习”和“偶像”(“多数”所崇拜的对象)。鲁迅上述所谓“排众数”“轻多数”,其实际矛头正是指向这种种深入人心而成为多数国民的精神桎梏的“舆言”“俗囿”“伪饰”“弊习”。鲁迅之所以把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介绍给中国人民,也就是这个道理。鲁迅呼号要“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鲁迅提倡介绍的是“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不取媚于群而随顺旧俗”、“抗伪弊习以成诗”的“摩罗诗力”……(《摩罗诗力说》)。如其说,鲁迅在这里要求对抗、“荡涤”的是群众,不如说是以“众数”面貌出现的“舆言”“旧俗”“伪饰”“弊习”。所以,一方面是“抗伪”,另一方面则是,“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同上),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鲁迅要蔑视、反对、粉碎的并不是“奴隶”群众自身,而是被加在“奴隶”群众身上的沉重的精神镣铐枷锁。鲁迅后来常讲的中国人奴隶成性,“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等等,实际指的也是这种状况,是指附在广大群众身上的、以“多数”面貌出现的那种社会统治意识。所以,鲁迅早年在介绍了拜伦、雪莱之后,特意指出了普希金“渐去斐伦(拜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它表明鲁迅超出了当时及以后许多人只知一味推崇爱慕“拜伦式勇士”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但普希金“终服帝力,入于平和”,最后屈服在沙皇威力下,歌颂俄罗斯武力,这又是鲁迅所深为不满的。于是紧接便提出莱蒙托夫“亦其爱国,顾绝异普式庚(普希金),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而大为鲁迅称许。但鲁迅所更称许的,则是那些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如波兰的密克维支,匈牙利的彼多斐。他们才是为民族为人民大众争自由的

“决无疑二”“洎死始已”的坚贞战士,不像普希金“自谓少年眷爱自由之梦已背之而去”的。其实,鲁迅在赞扬“摩罗诗力”的首要代表拜伦时,就指出,“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而“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反抗世俗与援助被压迫民族(希腊独立)是“兼以一人”,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交织在一起的。

鲁迅后来曾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两地书·二四》)。鲁迅早年以至前期无疑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不仅受严复和章太炎的影响,而且也受托尔斯泰和尼采的影响。^①但也正如超出严、章一样,鲁迅早年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也有异于托、尼。尼采心目中是无群众的地位的,在尼采,群众只是活该被践踏的庸氓,是与天才作对的虫豸。鲁迅始终没有这种敌视人民的观点,他从小对质朴的“农人”有强烈的眷恋,而自己则总是谦逊的。那种践踏群众高踞人民之上的超人哲学,与鲁迅本质格格不入。鲁迅鼓吹“摩罗诗力”,鼓吹“贵力尚强”,鼓吹强有力的人性,只是希望有人带头,终使整个国民“亦皆诗人之具^②”。尽管个性主义的孤独感对鲁迅一生有强大影响,渗透在思想、生活和作品中;但鲁迅一生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广大人民,即国民性的改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不但交织在一起,而且的确又是有消长起伏的。在早年浪漫主义期,表现在现象上个性主义似乎更突出一些,以后,则人道主义十分鲜明。但总的来看,我以为前一因素(人道主义)

① “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对联,据云曾为鲁迅首肯。托尔斯泰的思想,如列宁所指出,正是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时的思想情绪的反映。

② “败拿破仑者,……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排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摩罗诗力说》)

比后一因素(个性主义)要更为基本,更为持久,也更为重要。尽管从表面看来(例如常引尼采等)情况似乎相反。

但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之类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托尔斯泰的非暴力主义。鲁迅从来对旧事物和某些人有强烈的憎恨和厌恶,主张用强力去抵制、反抗它。这样也就用得上个性主义了,即“张个性”以抗“舆言”“俗囿”“弊习”“众数”。可见,还是有所爱有所憎。鲁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从改变国民性这一基本课题出发,去接受和改造各种思想、理论(从严复到章太炎,从托尔斯泰到拜伦、尼采,从进化论到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而形成颇有特色的早年浪漫思想。这种思想虽雄大但空泛,它作为改变国民性的答案,当然是没有实现也不可能成功的。

二 前期的两个阶段

1909到1918是鲁迅沉默的十年。青年浪漫思想期已经过去,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迫使鲁迅把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沉淀在、包裹在、压缩在冰一般的冷静的观察、探索中。1911年小说杰作《怀旧》已初露这种美学风格,虽然其中还有轻快笔调,反映着对当时革命还抱希望;但对落后的农村毫无变动(并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巨大震动相映对),鲁迅已表现了很大关注。国民性问题并没解决,革命倒证明了鲁迅早年的看法:办工业兴实业,“黄金黑铁”,固然不能解决救国问题,去皇帝改共和,也仍然不能使中国兴起。上层是一幕又一幕的政治丑剧,下层却永远沉沦在麻木、“平静”、不觉悟和被宰割的悲惨境地中,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人物毫无改变,“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朝花夕拾·范爱农》),“知县大老爷还

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阿 Q 正传》)。……

出路究竟何在?鲁迅并没有放弃国民性问题,而是在继续探索。1925 年春鲁迅仍然坚持:“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从世纪初在东京向许寿裳等人提出这问题,整二十余年了,问题依旧,但鲁迅这时的答案已有不同。代替“掇物质”“张个性”的早年浪漫理论的,是“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小说创作和白刃般的杂感散文。鲁迅提出并实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作为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和“闷死”的国民的主要武器。“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起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是为了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一七》)“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两地书·八》)这种思想一方面仍然是早年主张启蒙、主张排“舆言”“俗囿”的继续,所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集外集·题呐喊》),还是弄文以抗世。另一方面却又是这些主张远为具体深入的发展。因为鲁迅实际已经看到正是这古旧“文明”造成了国民性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的毒害,是使人民不觉悟、落后、麻木等等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文明”正是一切统治者所竭力维护的。鲁迅这时对改变国民性问题的答案,已落实在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揭露和猛烈批判上。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封建主义。鲁迅这时实际清算了早年受章太炎那种种谈国粹、讲道德、重宗教、轻物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等观念影响,看到了这些东西的严重的落后倒退的封建性质。鲁迅彻底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种种狭隘眼界,克服了民粹

主义的倾向,大踏步地向包括小生产意识状态精神面貌在内的封建主义猛烈开火了。鲁迅当时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围绕着反封建的启蒙而展开的:

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

从孔孟经书到二十四孝,从传统道德到宗教迷信;从“保存国粹”到“东方文明”,从“神童”到遗老,从《估学衡》到《咬文嚼字》,从《我之节烈观》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血蘸馒头治肺癆(《药》)到“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的感叹(《风波》)……,一支支无可抵挡的匕首和投枪射向了“根深蒂固”实即占据当时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坚决“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露出它吃人的真相。“我翻开历史一看,……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鲁迅希望青年与千百年统治社会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不再被这“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所俘虏所吃掉……,这突出地表明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作为鲁迅这一时期改变国民性而战的主题的巨大意义。可见,与早年相比,启蒙虽然依旧,但对待宗教、迷信、国粹、古代文化、西方物质文明等等问题的具体看法,与早年却很不相同,甚至刚好相反了。

杂文如此,小说也这样。从阿Q精神、祥林嫂到吕纬甫的思想苦痛,也都涉及所谓国民性问题。鲁迅后来说,“我的取材,多采

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便将所谓上层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还是“疗救”,但内容与早年已大不一样,不再是抽象的人性探讨^①,而是切实具体的社会揭露和批判。

鲁迅通过这些小说和杂文形象地展示了,旧势力的凶恶和厉害还不在真刀真枪,更在杀人不见血的旧意识形态的侵袭腐蚀中。“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样,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野草·这样的战士》)。陈旧的封建复辟势力不用说,包括摩登的外国思想代表(如当时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也一律对这“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古老、巨大、表面文质彬彬实际凶狠毒辣的所谓“东方文明”高唱礼赞之曲。花样繁复,人物多种,都是要保护、维持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以构成为地主买办阶级所需要的上层建筑。只有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对它进行理论上的彻底否定。鲁迅自己也在摸索这条道路。然而不是在理论上作出结论,而是进行具体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一直到晚年,鲁迅始终坚持了这种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毫不妥协地向一切传统意识形态和黑暗现实进行斗争。

但是,鲁迅又并不停留在这种批判上。本文认为,正如早年可

① “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人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怀亡友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

以 1906 年春弃医弄文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一样,鲁迅前期也可以 1925 年春参与女师大事件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如果说,前一小段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指向的主要还是广泛社会现象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那末,后一小段则直接地集中地打向了统治阶级本身——它的具体人格代表:“执政”(段祺瑞)“总长”(章士钊)和作为它们的帮凶帮忙的校长、教授、诗人、名流——杨荫榆、陈西滢、徐志摩之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它绝不是什么“纠缠于个人琐事”,没有意义;(也如鲁迅后来自己所说,“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恰好相反,它标志鲁迅所进行的战斗进入了一个与统治阶级特别是文化界统治者直接肉搏的新阶段。因之才招来了那么多的“流言”、诽谤、怨恨和迫害,^①“免职”、上黑名单(《大衍发微》),避居医院,终于不得不“逃出北平”离京南下。两本《华盖集》就比《热风》更为激烈紧张,斗争的气息和意识更为浓厚强烈,也更吸引着、激动着和有效地教育着人们和广大青年。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徐志摩并非独立的个人,他们是以段“执政”为后台的北洋军阀的一个统治集团。正是他们,从精神到肉体,从制造流言蜚语到运用行政手段,从解散学校到枪杀学生,残酷无耻地迫害、镇压和欺骗人民和青年。它们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活生生的人格化身和具体代表,鲁迅对他们的斗争是比前一阶段更为具体、直接的阶级斗争。这不只是一般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了,而是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一斗争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对鲁迅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鲁迅日益与也曾进行过“文明批评”“社会

① “他说文章攻击社会的黑暗面,借了小说的体裁,却不专指某人,所以容易令人不注意,其后,直接批评社会,有时为了批评的真切,简直借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来给某一群以倍击,于是这一群与之仇恨……”(许寿裳《关于鲁迅的生活》)。

批评”的“五四”同辈和青年根本区别开来,是起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的。鲁迅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等观念的接近和接受,也都与这场斗争有关。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强调以它作为鲁迅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界标。

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创造了用具体个人当靶子的战法,在架子不小面子颇重的中国上流社会,无情撕去绅士们的假面,还其本来样相,的确煞是好看。这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这些真人真事,即使只是一鼻一嘴一毛吧,合起来却成了难忘的典型。鲁迅以后就一直采用这种战法,无可阻挡地战胜了一切敌人。

在广泛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中,在这种日益深入的阶级斗争中,鲁迅不断具有和提出了许多接近和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或观念,这些观念是他 1927 年终于接受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根据和思想前提: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为基础”(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根本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一条原理。它本是一个“简单事实”,却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同上),为千百年各种统治社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抹杀和掩盖。鲁迅在上述批判和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念日益接近。早年那种轻视物质文明^①的浪漫观点和历史唯心主义已经放弃,从阿 Q 的

① 他晚年对“物质文明”则作了十分明确的阶级揭露:“‘物质文明’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食肥甘穿轻暖,住洋房的;一种却是吃树皮,穿破布,住草棚。”(《集外集拾遗·两种“黄帝子孙”》)既不同早年的一笔抹杀,也不同于前期初年的一般肯定。如果说章太炎由反资本主义而退向封建主义,鲁迅则由反资本主义而进向马克思主义。

“生计问题”，到《娜拉走后怎样》，从涓生子君的恋爱悲剧到大白菜堆成A字的喜剧，鲁迅在其小说、杂文、通讯中一再提出“吃饭”、“啖饭”、“饭碗”问题。“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坟·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同上），“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同上）。家庭尚且如此，社会更不用说。鲁迅并且指出，正是胃里鱼肉消化不掉的人们要掩盖人要吃饭这个基本事实：“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同上）。到后期，这一观念就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了，“……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1928年）。^①

与此紧相连，是对阶级分野的认识。早年那种章太炎式^②认为中国古文化“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破恶声论》）的糊涂观点也早已消去。“上等人”与“下等人”、“聪明人”与“傻子”、“阔人”与“穷人”、“治者”与“被治者”、“官魂”与“匪魂”“民魂”，祥林嫂的苦难与鲁四老爷的皱眉，爱姑的离婚与七大人的屁塞……，不断以鲜明对照的方式涌现在鲁迅的笔下。1925年，鲁迅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

① 鲁迅前期关于文艺起源于劳动和宗教等观点（《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② 章太炎认为中国比西方“去封建远”（指中世纪封建领主制），“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从而认为中国“无阶级”（指等级制）“最自由”云云。当时绝大多数人们不知道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指的是封建等级。孙中山也有此种观点。

也有残羹,野地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每斤八文的孩子”(《坟·灯下漫笔》)。认识或描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分野现象并不稀罕,当年五四运动新文学中好些作品也有过这方面的感受和描述。鲁迅的特点是在亲身的社会战斗中,是在与教授名流达官贵人总之上层社会代表人物的直接斗争中,来认识和提出这些观念的,这比旁观的或客观的感受描述,有着显然不同的分量。这一方面发展到1927年冬,鲁迅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就文学阶级性问题向梁实秋进行了人所熟知的著名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鲁迅的《未有天才之前》等许多杂文,也明白地表示了对这一观点的不断接近。早年那种“排众数”“非庸众”,强调天才个人的孤独也逐渐消逝。这是由于反“舆言”“俗囿”已日益取得打击的明确阶级方向的原故。打击对象(上层统治阶级)的明确,使革命动力和基础(人民群众)也日益明确。同时,这也与鲁迅在战斗中愈来愈获得广大青年的支持拥戴(特别是1925年后,女师大的斗争和厦门、广州的斗争)的亲身感受有关。但这问题前期并未彻底解决,它要到后期特别是1930年以后才取得“工农兵的明确方向”的。

鲁迅在自己的战斗中,还不断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根本思想相接近: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十》1925年4月)

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同上,十三,1925年4月)

这既是对鲁迅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的总结,同时也正是由于在与统治集团的直接斗争中使鲁迅痛感,能彻底打垮反动派的并不是笔,而是枪,不是文字,而是武力。“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两地书·二二》1925年5月。)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这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枪杀请愿学生)后写的。“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便杀人……”(《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孙传芳可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文章赶掉的。”(《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和后写的,前后一脉相承。很明显,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是突然跳出来,在前期的现实斗争中已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然而,最著名也是最突出的,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了。

鲁迅早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亲身感受过当时“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华盖集·补白》)的情况。辛亥革命后,这些“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啊”(同上),革命党于是也就“不咎既往”“咸与维新”。袁世凯上台二次革命失败后,这批人对革命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杀害。明的、暗的、集中的、零散的,其情节和手段都是相当惊人的。但这在当时谈得并不多,以后更被遗忘或掩盖。^①鲁迅却不能忘怀这许多同辈们的血。鲁迅“打落水狗”的坚

^① 至今对这段血腥历史叙述研究仍不够。

决主张是从这个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的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花费了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这是怀着满腔悲愤写下的历史教训。鲁迅接着举了秋瑾、王金发的例子，这都是他熟识的人和亲历的事。在《坟》的后记中，鲁迅再次慎重提醒读者：“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写的。”鲁迅晚年又一再提起这些事。^①

通过自己的战斗和总结历史的教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接近和吻合，这是鲁迅根本区别于仅从书本上获得或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地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历史、文化、革命的这种种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对鲁迅来说，不是一种抽象理论，不是口头上或文章中的空泛词句，它日益成为有血有

① 如《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

肉、与自己的生活、斗争、经历不可分割并必须依靠之的科学真理。^①

正是在这种坚实基础上,再经过 1927 年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更惨重的血的教训,“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集外集·俄文译文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三闲集·序言》)。“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题辞》)^②,在严肃的思考和认真的学习(这时学习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学说)之后,鲁迅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上述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似应从 1926 年冬离厦门前后算起,它的完成则可算在 1927 年秋冬到上海的前后。在厦门后期的思想和活动,《坟》的结集,《野草》的题辞,都或象征或标志在走向一个新的开始。而 1927 年冬在上海的好些论著、讲演,如《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等,则可以看出鲁迅在集中地考虑和阐述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作为理论武器来进行战斗,与前期零散、自发的阶级观点已很不一样了。本文认为,这几篇文章和讲演就是完成这个质的飞跃、鲁迅思想进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阶段的界标。当然,在后期,鲁迅思想仍在不断发展,从基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全面理解和熟练运用,从站在共产党一边到明确与工农结合自觉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从

① 所以鲁迅并非先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如今日课堂教学次序那样;情况恰好相反,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接近和接受,而后才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一切(1930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这样形成的,也并非先有辩证唯物论后有历史唯物论。(顺便说一下,马、恩并未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词汇和术语,它是由普列汉诺夫创始,列宁正式采用的。)

② 鲁迅把 1926 年的诗句重作 1927 年杂感集的题辞,显然有深意在。

初步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到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人都会有一个过程,鲁迅也不例外。所以即使后期,也还可以分出一些小的段落。但这个后期的起点却应该是1927年冬。如果《而已集》(前半)可说是前期的尾声,那么《三闲集》(后半)便可说是后期的序幕,从文章的内容、题材,以至文笔、风格,都展现出前后期的差异。到整个《二心集》,就更确定更明显了。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消沉无所作为;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愤慨而悲凉;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已无处可走,革命处在最低潮,鲁迅反而异常坚定、明确,尽管有血的“重压”,却“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而已集·尘影题辞》1927年12月,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前两次那种种消沉、无奈的情感阴影少多了,日益增多的是对前途的希望和自信,与前期的怀疑和彷徨成了对照。这也说明鲁迅在世界观上已完成了一个重要飞跃。他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经验,一下就牢牢抓住了它的精神实质,与自己的情感思想溶成了一体。

总起来看,鲁迅早年尽管在自然观上是唯物论,但世界观是历史唯心主义。前期具有了某些接近或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观念,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理论,不是任何零星片断的观念或观点的集合所能等同或替代,包括鲁迅上述接近或吻合历史唯物论的那些思想、看法也这样。因为这些思想、看法并没有自觉地系统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论证和掌握。鲁迅自己便承认,他并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研究者。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今天标榜这个主义,明日又信奉那个主义根本不同,尽管早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一股学习、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潮,《浙江潮》、《民报》等都有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但鲁迅对流行的种种理论,一概采取怀疑、拒绝甚

至厌恶、憎恼的现实立场。鲁迅从不轻信。在未经过实践验证以前,宁肯对它们采取保留的态度。因此,在后期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所能信奉的正式理论,仍然只能是他早年从《天演论》和自然科学中所接受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自然、生物、人类、社会必然向前进化。所以鲁迅经常提到它。虽然从早年起,进化论就并不能概括或代表鲁迅思想的全体。

早年的革命浪漫主义,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后期的马克思主义,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发展就是扬弃,其中有否定有继承。鲁迅对农民的同情和关注,对上层社会的憎恶和斗争,早年 and 后期是相连续的。但鲁迅对早年那种民粹主义的或小生产者的观点是彻底舍弃了(这点极重要也很不容易,有人如毛泽东一生都未做到),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加以否定了。这种否定和舍弃经历了无情的自我斗争。从来没有什么“天纵之圣”。把鲁迅说成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辩证唯物论者,在根本上便违反了鲁迅自己的说法和鲁迅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把鲁迅的后期与前期和早年截然割开,把早年看成一塌糊涂,也是错误的。或者,一再推迟鲁迅后期的开始年限,好像必须把它拉到“1928年下半年”甚或1930年之后才更“纯粹”,但世上并没有这种“纯粹”。并且这些论者也未提出这种分期的具体界标、内容和理由^①。当然,本文所提出的分期、分段也只是初步意见,可能被责难为割碎鲁迅之类,但本文认为,鲁迅就正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地向前迈进的,这正是鲁迅的伟大。否认这种思想发展的具体阶段性,只能导向把鲁迅神化或神秘化,把他捧入

^① 有人以鲁迅日记中的书帐来作为“理由”,似难成立。1928年书帐中马克思主义书籍大增,其实刚好证明鲁迅这时已经接受和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才如此认真深入地钻研它。

礼拜的庙堂,这恰好是对鲁迅的背离和侮辱。

三 知识分子的主题

鲁迅本人是知识分子。在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突出主题。这仍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刻反映。从戊戌经辛亥到五四,从五四经大革命到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同时又具有各种严重的毛病和缺点。他们的命运、道路和前途,他们的成长、变迁和分化,成为鲁迅所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农民问题同成为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中国近代两大历史课题。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这问题密切相关,也可以说,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是他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知识分子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同时又给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革命的,灰色的,反动的,先革命而后反动的,吃人的,被人吃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蔚为大观。

《怀旧》、《孔乙己》无论矣,他们是被《四书》《五经》吃空了灵魂的末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下层,那种迂臭、愚昧、空虚受欺侮迫害然而仍不掩其善良的牺牲品,鲁迅是用一种嘲讽而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灭亡的。与此相映对,是鲁迅对曾参加或企望过革命的同辈和下辈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从瑜儿、吕纬甫、魏连殳到涓生、子君,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便是鲁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寂无回响有如荒漠的莽原中,这些曾经满怀豪情闹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爬上去了,本身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当年赫赫有名的革命派,曾经编印过《黄帝魂》之类的影响很大的革命宣传品的章士钊,不就是典型代表么?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像

范爱农那些下层的,却终于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吞噬掉,完全消失和被人遗忘了。不但范爱农没人知道或无人问及,连当年轰轰烈烈的“鉴湖女侠”,也同样荒坟冷落,不再为人所记忆和提及了。他们虽不过一两个例子,其实代表着整个一代。出生入死建立功勋的最勇敢的革命党人被杀害,有的退隐消沉了,少数(当年革命派的某些上层人物)成了“新贵”,反动派篡夺大权,依然故我。例如,拿首义地区的两湖来说,被杀的焦达峰、陈作新(湖南的革命派首领人物)的墓木已拱,无人念及,杀人的主谋谭延闿(原立宪派)却成了国民党几十年的要人和大官。这种事例是太多、太多了。面对这种现实,秋瑾、陶成章、范爱农的身影怎能不再三浮现在鲁迅的心头、笔下?

五四运动过后,鲁迅又经历了这样一次“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分化。不论是当年曾悲歌慷慨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流血奋斗过的一代,也不论是当年曾振臂高呼为打倒孔家店而雄谈阔论的一代,都逐渐渺无声息,总之是被那巨大深重的旧黑暗势力吃掉或“同化”掉,于是自己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是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就是“前进”的,究竟能“进”到哪里,鲁迅也颇有怀疑。死者已矣,生者何如?曙光在何处?路在哪里?“新的战友在哪里?”(《自选集自序》)鲁迅看到一代又一代作为所谓先锋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末路和命运,有着巨大的愤慨和悲伤。鲁迅一往情深以歌当哭的那些极其沉郁优美的艺术作品,很多与这一主题有关^①。

① 以小说论,在《怀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在酒楼上》、《祝福》、《孤独者》、《伤逝》、《铸剑》这些最成功的作品中,以及鲁迅全部小说创作中,一半左右与此主题有关,具有浓厚抒情成分。另一半则是农民问题的主题,这一部分个人抒情成分要少得多。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彷徨·孤独者》）。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着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彷徨·伤逝》）。

极强烈的情感包裹沉淀在极严峻冷静的写实中，出之以中国气派的简洁凝炼，构成了鲁迅前期作品所特有美学风格。它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难和知识分子选择道路的艰难。这两个问题是极为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意境。把鲁迅前期作品和思想中的沉重、悲凉、孤独、抑郁，简单地一律看成消极的东西，低估它们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包括像《孤独者》这样冷峻哀伤的作品，使人读后的美学感受，也并不是低沉、消极或颓废；相反，它燃起的是深重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慨。鲁迅的小说、散文（如《野草》）所以能如此深入人心，具有那么强大、深刻和持久的感染力量，与这种美学风格直接有关。它使人玩味无穷，一唱三叹；低回流连，不能去云。这是那些所谓“通体光明”实乃一览无余的作品所完全不能匹敌的。

但是，到 1926—1927 年，上述那种沉重的抒情，开始近乎尾声了。斗志方浓，愁绪已淡，比较一下，就很显然：

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样写〔夜记之一〕》)

这里仍然孤独并有哀伤,但已不同于以前之沉重,最后一句是《野草》的题辞,它象征走向后期的思绪;而写于1927年春的《铸剑》,悲壮高亢,则可说是这一转折的预告。在后期,特别是在1930年以后的阶段中,鲁迅逐渐试图解决这个知识分子道路和前程问题。这就是认为应该走向工农大众,与广大工农共命运,同呼吸,为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而创作而斗争。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成果,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促使鲁迅明确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前期的孤独悲凉逐渐消去,明朗、坚定、酣畅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形成了后期文笔的风格,但毕竟丧失了前期更为优美深厚的文采。

从早年和前期起,鲁迅斗争的矛头经常就指向“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坟·题记》),即作为“用钢刀的”的帮凶帮忙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土、洋绅士章士钊、陈西滢之流。随后在上海滩头,则更是与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作过战,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到“唯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对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与对梁实秋、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就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极端

复杂的斗争中,鲁迅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和灵魂,对它进行了阶级的剖析,这成为鲁迅后期一个重要主题^①。这个主题具有特定的时代重要意义。因为,不同于以前,三十年代有大量知识分子或者从大革命中退下阵来,或者从迅速解体的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分化游离出来,他们麇集于上海和一些大中城市,数量之大空前。其中一些人信奉着各种时髦的主义和旗号,颇有不平,要求革命,也谋求个人的出路,于是造成了一个颇为热闹的“文坛”,其规模、性质、内容和复杂性,是五四或二十年代所不能比拟的。他们是新一代。鲁迅与他们的接触和较量,其数量和深广度也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样,随着时代的前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益增多,解决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道路问题,是更为突出和迫切了。

正是这些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鲁迅明确意识到,作为革命者,对工农群众可以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作为反动者,对工农群众却起欺骗和精神毒害的作用。他们是旧文化的承袭者,同时又应该是新时代的开拓人。尽管是枪不是笔才能打倒反动派,但文化战线上的清算任务也仍然很重。从而,鲁迅早年所朦胧地感受到的国民性问题,前期所归结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问题,这时很大一部分便落实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围绕着知识分子这一主题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占了比前更大的比重。也正是在这些新的战斗中,鲁迅自己的思想境界更迅速向前发展了。鲁迅后期更多地引证中国历史,鲁迅这时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与知识分子问题有关)采取了与前期不大相同的态度。不再是“不读中国书”,不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笼统提法,而是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

^① 关于后期这许多问题,应有专文来谈。

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里面就包括封建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不再是全体“国民性”问题,而是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承担者的知识分子的阶级性问题。鲁迅不仅猛烈地打击那些属于反动阶级一边的知识分子,而且也着重革命内部的“蛀虫”问题,一再指出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阶级性格和世界观实际都是大成问题的。鲁迅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给予极大的爱护和帮助,同时也不断揭露和批判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其他种种劣根性,特别是指出其中一些人实际拖着长长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尾巴,只要条件一具备,气候一适宜,就将暴露出来。例如,从鲁迅同辈和上辈的“想见汉官威仪”,到鲁迅下一辈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到更下一辈或沉溺于《庄子》《文选》之类的国粹,或呼喊“张大吃人的血口”。总之,帝王思想,才子佳人,或准法西斯……。本来,封建传统与资产阶级法西斯有某种内在联系。中国是个封建主义极长而资本主义启蒙工作做得极少的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发展得非常完备而成熟,它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上,而且渗透在人们的日常思想、生活、习俗中。它不但凶狠地吃掉人们,而且也笑吟吟地诱惑着人们。鲁迅不断看见他的同辈和下辈由提倡新文化始,以钻故纸堆终,由反对文言文的战斗始,以嘲笑青年写别字终的种种实例,深刻地感到旧势力的巨大和惯于“同化”革命者,吞没他们。千年陈货可以用新形式出现,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因为他们身上本来就伏着旧事物的魂灵。所以,从早年到晚岁,鲁迅虽然经历了思想的

重大变迁,但始终抓住启蒙不放^①。启封建之蒙,向它作持久的韧性的战斗。特别是在晚年,鲁迅对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总是剥其画皮,示其本相,以免它们贻害于人民。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深刻的启蒙思想家。

这种启蒙至今不失去它的深刻意义,中国革命将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号,实际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开倒车,退到封建时代去,他们还是通过知识分子为其鸣锣开道,不就是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现代历史的一幕么?

鲁迅曾经想写包括自己一代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可惜没有实现。所谓四代,前面已讲。这就是,章太炎一代,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其中的少数先进者参加(或受影响,下同)了戊戌,领导了辛亥。下面是鲁迅一代,这一代的先进者参加了辛亥,领导了五四。再一代的优秀者是五四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北伐)的各级领导者。最后一代是大革命的参加者或受影响者,以后抗日战争的广大基层的领导者。总之,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国革命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七代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和精神,优点和局限。例如最早两代处于封建社会彻底瓦解的前期,他们或来自农村环境或与社会有较多的关系和联系,大都沉浸在忠诚的爱国救亡的思想中,比较朴质认真,但他们又具有较浓的士大夫气息,经常很快就复古倒退,回到封建怀抱中去了。第三代眼界更宽,见闻更广,许多成为学者教授,有的则首创与农民战争结合

^①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进行武装斗争的光辉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和柱石,第四代大多数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群,聚集于城市,与农村关系更疏远一些了,他们狂热、激昂然而华而不实,人数较多,能量较大,其中很多人在抗日战争中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途,成了革命的骨干,第五代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其中的优秀者在目睹亲历种种事件后,在深思熟虑一些根本问题。第六代是在邪恶的斗争环境中长大成熟的,他们在饱经各种生活曲折、洞悉苦难现实之后,由上当受骗而幡然憬悟,上代人失去的勇敢和独创开始回到他们身上,再次喊出了反封建的响亮呼声。他们将是指向未来的桥梁和希望。总之,这几代知识分子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迈过了启蒙的二十年代(1919—1927),动荡的三十年代(1927—1937),战斗的四十年代(1937—1949),欢乐的五十年代(1949—1957),艰难的六十年代(1957—1969),萧条的七十年代(1969—1976),而以“四人帮”的垮台迈向苏醒的八十年代。当然,所有各代中都有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未计在内。每一代又还可再分,并且每代中又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性格,有些人则介乎两代之间,有些人则属于此代却具有上一代或下一代的典型特征……,如此等等。总之,他们的命运和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斗争,他们的要求和理想,他们的悲欢离合和探索追求,他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牺牲和苦痛,他们所迎来的胜利、欢乐和追求……,如果谱写出来,将是一部十分壮丽的中国革命的悲歌。鲁迅的遗志应当有人来完成。

鲁迅是不朽的。只是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去、现在和未

来息息相关。

(原载《鲁迅研究集刊》一九七八年)